

## 欧洲文坛旗帜的颜色与社会风潮的转向

郑春光

俄国形式主义奠基人什克洛夫斯基曾说：“艺术永远是独立于生活的，它的颜色从不反映飘扬在城堡上空的旗帜的颜色。”<sup>[1]</sup>这种为艺术争夺话语权的表述，到了王尔德那里变得更为激进。他在评述特纳的画作时说道，并非特纳在模仿泰晤士河上的雾，而是泰晤士河上的雾在模仿特纳。时过境迁，几十年前的结论，很难再适用于当今的欧洲文坛，不是因为过时，而是依然有些激进。或者说，欧洲文坛正在向传统回归，它非但没有独立于生活，反而被染上了一层悲凉的色调，走上了反映现实的老路。

自古“高树多悲风”。“悲调”大多是杰作的必备因子。在文学领域，似乎有一条铁律：“欢愉之辞难工，穷苦之言易好。”<sup>[2]</sup>文人若要写出佳作，必须语着沧桑，文风中透出一股悲凉。即便才情相当之人，如曹丕和曹植，命运多舛的后者也更有优势。刘勰就曾以此为二人盖棺定论：“文帝以位尊减才，思王以势窘益价。”<sup>[3]</sup>似乎一生失意之人，才能写出千古得意之文。于是，有人为求对仗工整，不惜让“舍弟江南歿，家兄塞北亡”。<sup>[4]</sup>可是，当下欧洲文坛的“悲色”来自何方？是否也有为求佳作而“大义灭亲”之举？

[1] 什克洛夫斯基：《文艺散论·沉思与分析》，引自什克洛夫斯基等：《俄国形式主义文论选》，方珊等译，北京：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，1989年版，第11页。

[2] 韩愈：《荆潭唱和诗序》，董诰等编：《全唐文》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7年版，第2493页。

[3] 刘勰：《文心雕龙译注·才略篇》，陆侃如、牟世金译注，济南：齐鲁书社，2009年版，第568页。

[4] 胡仔：《宋朝杂记》（下），见《茗溪渔隐丛话前集》（卷五十五），清乾隆刻本，中国基本古籍数据库，第244页。

## 欧洲文坛的悲色调

马拉美曾说，世界的存在只是为了一本书。这么说来，天神降下各种灾难，不过是为诗人提供吟唱的素材。面对沉痛的历史伤疤，欧洲各国的文人如同科勒律治笔下的老水手，执意要对别人讲述，似乎只有“讲完后之才能获得自由”。<sup>[1]</sup>他们挥毫泼墨，写出了一篇篇荡气回肠的“国殇”，构成了当下欧洲文坛的“悲色调”。

纳粹集中营是欧洲人挥之不去的梦魇，也成为作家取之不尽的题材，甚至侵入到电影、绘画等艺术领域。他们记录下纳粹的罪恶，揭露刽子手的凶残，为无辜的死者充当见证。然而，他们却始终担负着一个沉重的十字架：即自己荣耀的光环建立在他人血泪的基础之上。莱维（Primo Levi）、布洛夫斯基（Tadeusz Borowski）、策兰（Paul Celan）没有被纳粹集中营摧毁，反而在和平年代纷纷选择自杀，或许负罪感一直咬噬着他们的心灵。更多的幸存者则不堪重负，不愿在回忆中再次受苦，对所经历之事三缄其口，好像什么都没发生；与纳粹沾边之人，也鲜有勇气公开忏悔和反思。随着西格弗里德·伦茨（Siegfried Lenz）和君特·格拉斯的去世，敢于正视自己良心的人越来越少。再者，没有经历过纳粹苦难之人，则面临着另一个问题，即题材使用的合法性。难怪阿多诺宣称“在奥斯维辛之后，写诗是野蛮的”。<sup>[2]</sup>虽说诗歌不会因此而消亡，但诗人们却面临着一个巨大的困境：奥斯维辛之后，诗人何为？

对于这个问题，波兰诗人鲁热维奇（Tadeusz Różewicz）穷其一生都在思考。为此，他创造了一种新的诗歌体系（被称为第四体系或鲁热维奇体系）：主张摒弃一切隐喻，拒绝所有修饰，用赤裸裸的真实去对抗谎言，直面战争的残酷和法西斯的凶残，再现个人在强权压迫下的恐惧和战栗。他有二十余卷诗作问世，享有国际声誉。在戏剧领域，他提倡“荒诞派”戏剧和露天剧场，与贝克特、尤奈斯库齐名，探讨当代波兰在战争和苏共下统治下遭受的创伤，表现人在二战之后的无根性。正如他的诗行所言：“过去人们垂直地倒下、站起，如今人们水平地倒下。”他虽表现荒诞，却并不绝望；始终是以这种荒诞的手法与之对抗，为人类提供生的希望——不要因过往的痛苦而忘却缔造未来的希望。鲁热维奇被公认为巴尔干诗人的道德权威，去年他“垂直地倒下”了，与 T. S. 艾略特所说的正好相反，他结束的方式不是“嘘的一声”，而是轰然巨响。<sup>[3]</sup>

[1] Samuel Taylor Coleridge, "The Rime of the Ancyent Marinere", in William Wordsworth, Samuel Taylor Coleridge, *Lyrical Ballads*, eds. R. L. Brett, and A. R. Jones, London: Methuen & Co., 1963, p. 33.

[2] Theodor W. Adorno, *Prisms*, trans. Samuel and Shierry Weber, Cambridge, Mass.: The MIT Press, 1981, p. 34.

[3] T. S. Elliot, *The Complete Poems and Plays of T. S. Eliot*, New York: Harcourt, Brace and Company Inc., 1952, p. 344.

柏林墙，是插在德国人心口上的一把利刃。它将德国一分为二，让本是同根生的同胞骨肉分离，甚至剑拔弩张。去年恰逢柏林墙倒塌二十五周年，以此为主题的作品层出不穷、备受瞩目，其中不乏大奖得主和文坛名宿。鲁茨·塞勒（Lutz Seiler）的小说《克鲁索》（*Kruso*），以柏林墙坍塌前夕为背景，将故事发生地设在波罗的海上的一个小岛，巧妙地把历史和现实结合在一起，用一个餐厅的破败写出了东德衰落的民族寓言。该书一举囊括了德国图书奖（这是该奖历史上第三部以此为主题的作品）、乌韦·约翰逊文学奖和卡什尼茨文学奖，《明镜》周刊甚至将其与托马斯·曼的《魔山》相提并论。黑塞文学奖得主、德国女作家克吕森多夫（Angelika Klüssendorf），以自己逃离东德的经历为基础，创作了《四月》（*April*）。该书是《女孩》（*Das Mädchen*）的续篇，讲述了一个名叫“四月”的女孩，经常打破各种人为障碍，并成功跨越东西德边界的故事。耄耋之年的于根·贝克尔（Jürgen Becker），素以文体、语言和叙事革新而著称，并因此荣获德语文坛最高荣誉——毕希纳文学奖。然而他的作品并非只是轻盈的先锋派实验，始终具有沉重的历史感。如具有很强自传色彩的《离别故事》（*Aus der Geschichte der Trennungen*），主人公在柏林墙倒塌后每年都穿越东西德，以此试图重拾昔日的记忆，直面战争的残酷。在初出茅庐的新秀作家中，以柏林墙为题的也不乏其人。德克尔（Markus Decker）的小说《第二家园》（*Zweite Heimat*），描绘了柏林墙倒塌后，西德人迁往东德的故事。林图尔（Fiona Rintoul）的处女作《莱比锡事件》（*The Leipzig Affair*），讲述一个年轻的语言学家逃离东德后的困惑和迷茫，在柏林墙倒塌后，她不得不重回故地寻找答案。

柏林墙不仅是德国作家的专属，英国文坛也有人关注它。当今红得发紫的作家肯恩·福利特（Ken Follett），出版“世纪三部曲”第三卷《永恒的边缘》（*Edge of Eternity*），又一次引起了万人空巷的疯抢。作者野心勃勃，在书中勾勒了五个世界家庭的悲欢离合，穿插着冷战、古巴导弹危机、柏林墙、民权运动、越战等世界大事，并以柏林墙的倒塌做结。作者声称，该书畅销恰逢柏林墙倒塌二十五周年，不过是一个巧合而已。然而，诸多作家都对柏林墙念念不忘，却绝非巧合。这并非仅仅如同林图尔所说，柏林墙的倒塌是二战最终结束的标志；更在于，它是德国乃至欧洲一道无法抚平的伤痕。

内战，是炙烤西班牙人的火柱。许多作家深受其苦，或内心流亡，或流亡海外，以此为题材创造了大量的作品。2010年塞万提斯奖得主马图特（Ana María Matute），被称为“受惊吓的孩子一代”的一员，内战的残酷是她童年无法抹去的阴影。她常用天真的儿童视角，表现战争的恐怖及对社会造成的创痛。内战让她的童年蒙上了阴影；

即使内战之后，她依然饱受迫害，掌权的弗朗哥政府对她的作品进行严格的审查，但她始终笔耕不辍，不为强权所趋，反思战争对人类的精神创伤，创作了《初忆》《士兵在黑夜哭泣》《无人的天堂》等作品。西班牙国王胡安·卡洛斯一世称她是“当代最伟大、最独特的作家之一”。虽然她2014年作古，却后继有人。西班牙资深作家戈伊蒂索洛(Juan Goytisolo)，一生都在与弗朗哥独裁统治进行对抗，被迫流亡世界各地，其代表作《身份的标志》《无土地的胡安》等，大多反映西班牙内战对社会和自己的创伤，并荣获了去年的塞万提斯奖。

不仅如此，法国龚古尔文学奖得主萨尔维尔(Lydie Salvayre)，也在吟咏西班牙内战。虽然她生于法国，父母却是西班牙内战的难民；其获奖作品《不要哭泣》(*Pas pleurer*)以西班牙内战为背景，通过年过古稀的母亲回忆，再现了战争给人类造成的灾难。她还描绘了法国大作家乔治·贝纳诺斯反抗弗朗哥政权的努力。若纵观2014年的法语文坛，获奖作家多以二战为背景，莫迪亚诺因“唤醒了对人类不可捉摸命运的记忆，展现了纳粹占领时期普通人的生活”，获得诺贝尔文学奖。勒诺多文学奖得主冯金诺斯(David Foenkinos)，在作品《夏洛特》(*Charlotte*)中关注的是奥斯威辛的悲剧。

综上所述，优秀的作品往往出自羁旅草野之人，在经历山河破碎、骨肉分离之后，用落魄的一生换来一曲悲歌。就连澳洲人弗拉纳根(Richard Flanagan)，也是凭借一曲悲音摘得布克奖。他的作品《崎路向北》(*The Narrow Road to the Deep North*)描写战俘们被迫修建“泰缅铁路”的悲惨经历。为求真实，他历时多年，数易其稿，甚至亲赴泰国现场，体验搬运石料的艰辛。这可谓“穷苦之言易好”的绝妙注释。难怪，尼采会将诗人的歌唱与母鸡的咯咯作比，认为二者都是痛苦使然。说到底，这种文学源于痛苦的观点，是一种文学反映生活的模仿论。由此可见，欧洲文学主潮在经历了各种先锋实验之后，大有向传统回归之势。

## 欧洲社会风潮的右转

如果这种欧洲文学主潮的假说属实，那么勾稽爬梳文坛的动态，就能窥见社会风潮的一些蛛丝马迹。去年，欧洲发生了几起争议事件，表面看来只是孤立的“症候”，但若挖掘其背后的“沉默”和“空缺”，就可号出欧洲的时代脉搏：它的社会风潮正在向右偏转。

先看法国。虽然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迪亚诺风光无限，但在畅销书榜上，他的

新作却败给了泽穆尔（Eric Zemmour）的《法国自戕》（*Le Suicide Français*）。该书问世以来，一直雄踞榜首，第一版很快就售罄。作者是一个带有极右色彩的记者，在书中公然为维希政府辩护，声称它并未迫害过犹太人，而是尝试拯救他们脱离纳粹集中营；即使有过迫害举措，也是为救人而采取的政治手段，75%的犹太幸存者都得益于此。作为阿尔及利亚犹太移民的后裔，作者的说法似乎言之凿凿。他更进一步，全盘否定了法国的主流价值观。他认为，自戴高乐去世以后，法国在一步步走向自戕：同性恋、女权主义和伊斯兰等左翼思想摧毁了传统的价值观，使法国社会深陷政治和经济重围。法国本是“犹太—基督教”国家，不应该接纳外来的穆斯林。要重振法国，必须回归传统。他的很多观点，公然挑战了美国历史学家帕克斯顿（Robert Paxton）。作为回应，帕克斯顿指责作者说空话，回避维希政府的反犹太法。无疑，很多人会谴责作者思想反动；但作品的畅销却反映出法国社会的右倾之风：反伊斯兰情绪在四处蔓延，昔日犹太人的境遇，如今转移到了穆斯林身上，若以此态势发展，《查理周刊》袭击事件可能会重演。

再看德国。政府虽采取各种措施打压极右翼势力，却对希特勒自传在英美的畅销束手无策。因为早在20世纪30年代，该书的英文版权就卖给了美国的出版社。在希特勒生前该书销售逾千万册；二战后巴伐利亚政府明令禁止再版，使该书在德国近乎绝迹。不过，它从未淡出世界市场，甚至在克罗地亚、俄国、印度、土耳其等国热卖；而且互联网让电子版触手可及。巴州政府曾支持历史研究机构推出注释版，但左翼党人极力反对，认为这是打着历史研究的幌子传播法西斯思想；因为该书极具煽动性；而且会再次揭开纳粹受害者的伤疤。面对来自各方的压力，政府只好取消这一举措。然而，这绝非明智之举。在互联网时代，要禁止该书无异于掩耳盗铃；而且禁书的标签往往会让人铤而走险。更甚的是，该书的版权在今年到期，州政府纵使百般努力，终会黔驴技穷。极右派人士表示，若有任何人阻挠该书出版，将与之对簿公堂。届时，该书的版本必然鱼龙混杂，新纳粹分子甚至会推出自己的版本。与其让德国人直面混乱，不如祛妖魔化，推出注解版厘清错误。虽然德国的民主体制很健全，但政府显然对人民判断是非的能力缺乏自信；或者说，它更担心的是那股潜在的极右之风。

最后来看意大利。去年黑手党服役犯人格拉索内利（Giuseppe Grassonelli）出版自传，赢得西西里夏侠文学奖，引起了轩然大波。因为该奖所命名的作家夏侠，以揭露黑手党的罪行著称。火上浇油的是，有一部入围作品的作者是反黑手党法官的女儿，其父曾被黑手党谋杀。该奖的评委兼创立者之一、夏侠生前好友阿涅洛（Gaspare Agnello）愤而辞职。他说，格拉索内利从没充当过污点证人；他的罪行给受害者造成



了无法治愈的创伤。然而，他却在书中将其合理化，将黑手党的个人谋杀行为描述为战争所需。该书的合作者为之辩护说，人非圣贤，孰能无过？过而能改，善莫大焉。而且该书非常励志，作者进监狱时是个文盲，如今他拥有一个文学学位。虽说辩护铿锵有力，但无可否认，黑手党是意大利难以消除的痼疾，罪犯获奖与右翼势力抬头不无干系。

不难看出，欧洲文坛映射出了一股右倾之风；但这能否在政坛中得到证实？下面让我们纵览一下欧洲政坛。在马琳·勒庞的领导下，法国极右翼政党国民阵线深得民心；英国奈杰尔·法拉奇带领的独立党异军突起，成为左右政局的重要力量；德国极右翼党派的支持率有所增长，去年10月还爆发了名为“PEGIDA”的排外运动；意大利被民粹主义者格里洛及其五星运动党搅得天翻地覆；瑞典极右翼民主党支持率明显攀升；匈牙利的青民党政府具有威权主义倾向；奥地利、希腊等国的民粹政党势力强劲；苏格兰、加泰罗尼亚和威尼斯等地都想独立……这些右翼势力大都敌视外部世界：反对移民、欧盟和全球化。可以说，欧洲政坛正刮起一股民粹主义的旋风，社会风潮开始右转。这进一步坐实了欧洲文坛主潮向传统回归、开始反映现实的观点。

## 结语

或许，欧洲作家们厌倦了轻飘飘的先锋派实验，开始落到实处，感时伤怀，将个人的坎坷与家国的破败相连，让文字多了一层厚重感。如果时光轮转，伍尔夫、普鲁斯特等现代派作家，定会对此嗤之以鼻。不可否认，若一味把文学与现实挂钩，容易犯“意图谬误”，失了“造艺之本心”，甚至会出现“政治挂帅”的局面。但是，如果切断了文学与现实的脐带，让它如同幽灵一般飘浮在空中，难免会出现无病呻吟之作和“大义灭亲”之人，甚至是亡国亡家的靡靡之音。

荣格曾将艺术与现实的关系比作植物与土壤的关系。人们可以通过了解孕育植物的土壤，知道植物的特性：“但却没有人会同意说，对植物本身来说，一切重要的东西就已经都被发现了。”<sup>[1]</sup>同样，如果未经土壤的培育，也不会出现参天的大树。因此，欧洲文坛向传统回归是大势所趋；然而，它所反映出来的右倾风潮，却需要我们加以警惕。

（塞浦路斯大学宇宸博士、尹琴硕士，对本文的法语、德语部分有所贡献，特此感谢。）

[1] 荣格：《论分析心理学与诗歌的关系》，《心理学与文学》，冯川、苏克译，北京：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，1987年版，第109页。